



三民叢刊

胡適叢論

周質平著



胡適叢論

周質平著

三

民

叢

刊

48

三民書局印行

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胡適叢論／周質平著．--初版．--臺北
市：三民，民81
面； 公分．--(三民叢刊；48)
ISBN 957-14-1899-4 (平裝)

1. 胡適-傳記 2. 胡適-學識

782.886

81002706

© 胡 適 叢 論

著 者 周質平

發行人 劉振強

出版者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印刷所 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／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六十一號

郵撥／〇〇〇九九九八——五號

初 版 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七月

編 號 S 12082

基本定價 肆元陸角柒分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〇二〇〇號

有著作權、不准侵害

ISBN 957-14-1899-4 (平裝)

自序

周質平

過去幾年來，我教學和研究的興趣主要集中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，尤其是二、三十年代知識份子所熱烈討論的一些問題，如「國故整理」、「全盤西化」、「科學與玄學」、「民主與獨裁」，這幾場代表時代思潮的論爭。本書所收的幾篇文字大多是以胡適（一八九一—一九六二）為中心，圍繞着這幾個題目而進行的分析與探討。

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，胡適無疑的是一個中心人物。從提倡白話文到「打倒孔家店」，從「國故整理」到「全盤西化」，他不但是提倡者，也是總結成果的人。就學術研究而言，胡適的影響及於中國哲學、文學、史學各各層面。甚至於近代中國語法的研究，胡適也是少數先驅者之一。就社會改革而言，從喪禮改革到婦女解放，從個人主義到「好人政治」，這些口號和運動都是和胡適分不開的。

1. 序 自

從這個角度來看胡適，他幾乎成了所有新思潮的總匯；於是新思潮所引起的種種結果和

功過，都或多或少地落到了胡適的頭上。他一方面固然是「衆矢之的」；但在另一方面却也是衆善之源——所有改革的原動力。胡適成了一個不是「首功」就是「罪魁」的兩極人物。

五十年代由中國共產黨所發動的胡適思想批判，把胡適「罪魁」的形象提升到了最高點，但在此同時，却也是對胡適思想的價值和影響作了最高的肯定。胡適的片言隻字都成了他們聲討的對象。要知道：批判的背後總是隱藏着恐懼的。

在獨裁和極權的統治之下，特別能看出理性的力量！許多批評家常說胡適「軟弱」，但胡適的「軟弱」絕不意味着「無力」。胡適的「弱」是「柔弱勝剛強」的「弱」，而不是「衰弱」或「微弱」的「弱」。因此，「軟弱」的另一種解釋是溫和而穩健。溫和穩健是持久的基本條件，而持久的本身却是一種力量。

胡適在新文化運動中，是個最能利用激進思想來打開新局的人，但他同時也最能了解激進思想的局限。激進的言論，有它的作用，它能在短時期之內，引起人們的注意，使人們從沉睡中驚醒。然而，過激的言論，也能引起意想不到的阻力，延緩改革的進程。尤其是清醒之後，理智的分析取代了感情的衝動，煽動性的言論在這個時候，就很難再起作用了。

五四早期的陳獨秀（一八七九—一九四二）、魯迅（周樹人，一八八一—一九三六）

和錢玄同（一八八七—一九三九）等人在「醒睡」的過程中，都曾出過大力，建過奇功，但喚醒之後，這些早年大將都不免有點亂了陣腳，失了故步。錢玄同當年積極提倡白話文、新詩，廢滅漢字，而晚年却常以小篆、隸書寫古典的文言，由「疑古」漸漸轉向「信古」，甚至於「戀古」，這是老年轉向保守反動的一個顯例。而陳獨秀、魯迅等早年德先生、賽先生的擁護者，而後竟漸漸轉向民主自由的反面，在政治上相信社會主義。唯有胡適能夠堅持他民主、自由、科學的信念，始終和舊社會、舊思想鬭爭。這實在是新文化運動中極值得注意的一個現象：放火的人很多，等火勢燎原之後，善後的人却寥寥無幾。或是等火勢既起之後，許多人都不願再走從文化思想上進行改革的這一條路，而想在政治改革上另覓捷徑。結果是捷徑沒有找着，却把中國引上了一條社會主義的死路，這是近世中國的大悲劇。

今年是胡適百歲生日，回顧近百年來中國思想史的發展，我們所不缺的是感情的衝動與暴力的摧毀。知識份子受了幾個政治口號的驅使，心甘情願的去為一個虛無縹渺的「主義」為牛為馬，為魚為肉。真正的悲劇並不在知識份子為「主義」所用，而是在知識份子如此虔誠的信仰那個主義，如此甘心的樂為所用。這種無怨無悔，死而後已的奉獻和信仰才是悲劇的核心！

胡適思想在二、三十年代「主義」的狂熱中，是一劑有效的清涼散。民國以來，多少「青年導師」、「思想界的權威」，多少自以為是「心理醫生」的作家文人，他們所開的處方都是一劑比一劑更强的「興奮劑」。只有胡適不斷的在潑冷水，要人清醒。要知道：火上加油是可以贏得喝采的「羣衆路線」，而潑冷水却往往是犯衆怒的。然而清涼散畢竟才是這個熱昏了頭的民族的及時良藥。回看史實，我們不得不說：各種利用羣衆感情的過激言論，畢竟都只是革命洪流中的一些飛沫浪花，唯有理性和溫和才能造成真正而持久的力量。

本書的出版要特別謝謝普林斯頓大學 (Princeton University) 汎森兄和費城天普大學 (Temple University) 偉動兄的介紹和聯繫。哈佛大學趙如蘭教授提供了許多有關趙元任的珍貴資料。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明之兄寄贈了康奈爾大學所藏〈胡適檔案〉的徵捲。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的胡明兄抄寄了胡適的〈非留學篇〉。我的學生 Christopher E. Olofson 在搜尋胡適英文著作時，與全美各大圖書館聯繫，在編訂書目時，仔細校對。我要在此向以上諸位一一道謝。

本書所收的幾篇文章曾先後在臺北的《中國時報》、《中央日報》、《漢學研究》、美國的《知識份子》、《九州學刊》及香港的《明報月刊》、《二十一世紀》、北京的《近代史研究》等刊物上發表過。其中〈胡適與魯迅〉一篇，曾收入我一九八八年出的《胡適與魯

迅》一書，這次我作了相當的改動。《胡適與趙元任》一篇，曾收入李又寧教授主編的《胡適與他的朋友》一書。《評胡適的提倡科學與整理國故》，曾收入時報出版公司主編的《胡適與近代中國》一書。在此我要感謝諸位編者，允許我將這幾篇文章彙印成書。

在日常生活中，讀書寫作是忙亂中的一片寧靜。但沒有我妻善珍的操持，我是無由獲得這片寧靜的。在這本書印行的前夕，我特別感念她的辛勞和忍耐。

在過去不到兩年的時間裏，父母先後謝世。我用這本書的出版來紀念生我、養我、育我的父母親。

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四日胡適百歲生日前三天在普林斯頓大學

目 錄

自序

評胡適的提倡科學與整理國故

胡適對民主的闡釋

胡適筆下的日本

胡適與馮友蘭

胡適與趙元任

胡適與魯迅

吹不散的心頭人影

——記胡適與曹珮聲的一段戀情——

附錄

一、遺文新刊

—— 胡適的〈非留學篇〉 ——
二、胡適英文著作編年及分類目錄

評胡適的提倡科學與整理國故

一、胡適所說的科學

最能代表五四精神的兩句口號是「德先生」與「賽先生」，也就是民主與科學。當時對這兩個口號提倡最力的是《青年雜誌》（自一九一六年九月出版的第二卷第一號起，更名為《新青年》）。

一九一五年九月，陳獨秀（一八八〇—一九四二）在《青年雜誌》發刊詞〈敬告青年〉一文中，對當時青年提出了六項建議，其中第六項就是「科學的而非想像的」，並為「科學」下了一個簡單的定義：「科學者何？吾人對於事務之概念，綜合客觀之現象，訴之主觀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謂也。」^①並指出科學是根治迷信、無知唯一的利器。在這段文字裏，科學顯然被界定為一種思維的方式，可是隨後在講到科學的功用時，有許多指的卻是可以應用

的自然科學。

一九一九年一月，也就是五四運動前的四個月，陳獨秀在《新青年》第六卷第一號上，寫了一篇《本誌罪案之答辯書》，他明確的指出：提倡民主與科學是《新青年》創辦三年以來，主要的方向，也是《新青年》受到社會攻擊主要的「罪狀」。他把反孔、非孝，種種打倒舊道德、舊倫理、舊政治制度的起因，都「歸罪」於擁護「德先生」與「賽先生」。在文末，他肯定的指出：

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先生（作者案：民主與科學）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、道德上、學術上、思想上一切的黑暗。若因為擁護這兩位先生，一切政府的壓迫，社會的攻擊笑罵，就是斷頭流血，都不推辭。^②

陳獨秀不但把《新青年》雜誌的使命，定在推行民主、科學上，同時也表現出一種為提倡民主、科學而不惜犧牲一切的決心。

陳獨秀對民主、科學的這種態度，在三十六年後（一九五五）曾受到胡適的批評。胡適說陳獨秀把民主和科學「人格化」（personified）成了「德先生」和「賽先生」，而人格化的抽象概念，往往等於「神化」。一種神化後的概念是可以引起「盲目的迷信」和「盲目的崇拜」的^③。

胡適在一九二三年寫的〈科學與人生觀序〉中，總結了自十九世紀末年以來「科學」一詞在中國思想界的地位：

這三十年來，有一個名詞在國內幾乎做到了無上尊嚴的地位；無論懂與不懂的人，無論守舊和維新的人，都不敢公然對他表示輕視或戲侮的態度。那個名詞就是「科學」。這樣幾乎全國一致的崇信，究竟有無價值，那是另一個問題。我們至少可以說，自從中國講變法維新以來，沒有一個自命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毀謗「科學」的。

① 過份的推崇科學，過份的神化科學，過份的強調科學的萬能，結果是把科學又變成了一個新的權威，一個新的迷信，一種新的宗教——科學成了它自己所要打倒的對象。「科學」一變而成了「不科學」。

因此，胡適對「科學」的解釋與態度是和陳獨秀不同的。他特別強調的是科學的方法和精神，而不是它的實用性。他在晚年所寫的一篇手稿〈四十年來中國文藝復興運動留下的抗暴消毒力量——中國共產黨清算胡適思想的歷史意義〉中，對「科學」這一概念有總結性的說明：

科學的真意義只是一個態度，一個方法。⑤

接著他說道：

科學不是堅甲利兵，飛機大砲，也不是聲、光、電、化。那些東西都是科學的出品，並不是科學本身。科學本身只是一個方法，一個態度，一種精神。這個方法並不是西洋人單獨發明的，乃是人類的常識加上了嚴格的制裁和訓練。^⑤

他更進一步指出：

科學的精神不是致用，只是求知，是純粹「無所為」的尋求知識，是為真理而尋求真理，為知識而求知識。^⑦

胡適說：這種「為知識而求知識的科學精神」在五四前後很不容易為大家所接受。^⑥

陳獨秀強調的是科學的實用性——科學可以破除迷信，增加生產，醫治疾病，造福人類。胡適則認為：科學誠然有這些功能，但這些功能並不是科學本身。換句話說，胡適是從哲學的層次來理解科學的。在這個哲學的層次裏，科學是一種懷疑的態度，是不信一切沒有證據的東西，是「大膽的假設，小心的求證。」^⑧

二、科學方法與整理國故

胡適這種科學精神的實際應用，就是發揮在考據和整理國故上。一九一九年八月，在一

封寫給毛子水論國故學的信中，他首先要毛子水拋開「有用無用」的成見，拋開「狹義的功利觀念」，而用「爲真理而真理」的態度來研究學術。在這封信裏，胡適還說了一句以後常爲論者所引用的話：

學問是平等的，發明一個字的古義，與發現一顆恆星，都是一大功蹟。^①

胡適爲了強調「學問是平等的」這一點，就不免過份誇大了「發明一個字的古義」的意義。「發現一顆恆星」是「宇宙之大」，而「發明一個字的古義」雖不至於是「蒼蠅之微」，但也絕不能將這兩件事等同起來，使許多在故紙堆裏討生活的人自以爲是逍遙在穹蒼之中——把推敲一個字的古義認做了科學工作。

胡適對整理國故的態度，到了一九二八年有了相當的改變，這個改變可以說是從純粹的「爲真理而真理」的非功利的治學觀點，漸漸了解到學術研究與國計民生完全脫節，也有危險和荒謬的可能。

一九二八年，胡適寫〈治學的方法與材料〉，他指出：清代的考證學由於受限於紙上的材料，始終不能由故紙堆走向實驗室，三百年樸學的成绩，終究不過是「故紙堆的火焰」而已^②。他將清代考證學的成绩總結爲：

我們考證學的方法儘管精密，只因為始終不接近實物的材料，只因為始終不曾走上實

驗的大路上去，所以我們三百年最高的成績終不過幾部古書的整理，於人生有何益處？於國家的治亂安危有何裨補？雖然做學問的人不應該用太狹義的實利主義來評判學術的價值，然而學問若完全拋棄了功用的標準，便會走上很荒謬的路上去，變成枉費精力的廢物。⑬

雖然胡適一再將清代學者的治學方法許為合乎「大膽假設，小心求證」，「尊重事實，尊重證據」的科學方法⑭，但論到清代學者的總成績時，他是極其嚴厲的。如他在〈國學季刊發刊宣言〉中說：

這三百年之中，幾乎只有經師，而無思想家；只有校史者，而無史家；只有校注，而無著作……清朝的學者只是天天一針一針的學繡，始終不肯繡鴛鴦。所以他們儘管辛苦殷勤的做去，而在社會的生活思想上幾全不發生影響。⑮

從上引的兩段文字中，可以看出：胡適並不贊成與國計民生完全脫節的學術研究。

拿胡適評判清代考證學的標準來看一九二〇年代的國故整理。我們不得不說：國故整理畢竟不是西洋科學的渡海東來，而是乾嘉考證的變相復興。我們將上面這段胡適批評清儒的話，只要略改數字，也一樣可以用來總結胡適學生「考據」的成績：

胡適考據的方法儘管精密，只因為始終不接近實物的材料，只因為始終不曾走上實驗

的大路上去，所以胡適一輩子四十年考據最高的成績終不過幾部古典小說的整理，一小部份禪宗史料的釐清，以及《水經注》疑案的審查。這些成績於人生有何益處？於國家的治亂安危有何裨補？

這樣評斷胡適在整理國故上的貢獻，顯然是失之過苛。但如就對「人生有何益處？」「於國家的治亂安危有何裨補？」這兩個問題來談胡適的考據，則上面這段套用他自己文字改寫的話，卻也並非完全失實。

總的來說，胡適往往貶低清儒考據成績，而誇大二十年代整理國故所能引起的社會作用。他在〈給浩徐先生信〉中，表明了他對整理國故的期望：

用精密的方法，考出古文化的真相；用明白曉暢的文字報告出來，叫有眼的都可以看見，有腦筋的都可以明白。這是化黑暗為光明，化神奇為臭腐，化玄妙為平常，化神聖為凡庸；這才是「重新估定一切價值」。他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，可以保護人們不受鬼怪迷惑。●

因此，胡適把整理國故的工作稱之為「捉妖」、「打鬼」。胡適一方面說，要為「學術而學術」的來整理國故；但在另一方面，我們又可以看出，整理國故，「還他本來面目」都不過是手段，而「解放人心」才是真正的目的。